

# 嬗变的帝国主义及其空间话语批判

吴红涛

(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江西上饶, 334001)

**摘要:**“空间”是透视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帝国主义从一开始便形塑了极具辨识度的空间话语,无论是旧帝国主义时期的领土扩张与地理殖民,还是新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输出与市场垄断,都包含了鲜明的空间性。在帝国主义的演变进程中,出于转移内部空间矛盾和化解内部空间危机的需要,其空间话语经历了由“内”而“外”的地理位移。对“外空间”的侵占、剥夺和打压成为帝国主义最为主要的空间策略。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帝国主义转而采取了更具伪装性和迷惑性的空间话语,继续维系其在帝国之外的空间霸权。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将凸显空间的等级性、追求空间的非均衡性、制造空间的破坏性。对嬗变的帝国主义及其空间话语进行批判性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辨识帝国主义的发展动向和透视帝国主义的本质。

**关键词:**帝国主义;空间;帝国;殖民;霸权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1)05-0155-11



时至今日,关于“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论争依然不绝于耳。戴维·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指出,帝国主义并未终结,我们见证了一个“帝国主义新时期”(new age of imperialism),其特征显现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货币市场、蔓延全球的生产系统、极富侵略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好战的军国主义<sup>[1]</sup>。和以往主张殖民侵略和殖民剥削的旧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主义在当下正变得愈来愈具有伪装性和迷惑性。为此,当代学界一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路数,针对帝国主义的研究相继提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数字帝国主义”(Digital Imperialism)等概念。这形象地印证了“帝国主义”一词强大的生命力。这种语境下,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也适时浮出水面,为我们审视帝国主义提供了另

一种可能性。事实上,不少学者已经将“空间”与“帝国主义”放置在一起考察,哈维(David Harvey)曾指出,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进程”<sup>[2](24)</sup>;奈格里(Antonio Negri)曾认为,“帝国的系统的结构可以用空间和时间来表达”<sup>[3](5)</sup>;而雅各布斯(Jane M. Jacobs)则强调:“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讨论,已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空间的思考。”<sup>[4](19)</sup>审视以上观点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并未就此展开更为详尽的讨论,他们或者把重心放在空间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没有凸显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或者忽略了帝国主义概念的多义性,尤其是没有关注到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在多阶段演变过程中所显现的内外差别。我们知道,“话语是由符号所构成的,然而话语所能做的,远不止是使用这个符号以确指事物”<sup>[5](54)</sup>,和语言不同,话语远远超出了事物本身所直接指涉的信息,它映射了一个更

收稿日期: 2021-04-21; 修回日期: 2021-07-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空间帝国主义及其批判研究”(20BZX012); 2019年江西省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批判研究”

作者简介: 吴红涛,江西上饶人,哲学博士,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空间哲学、伦理美学,联系邮箱: 179234699@qq.com

为广阔与复杂的符码世界,糅合了既定语境中关于知识、权力、文化等多元指征<sup>[6]</sup>。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空间话语即是指代那种交织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政治。本文以此为基础,以“空间”的专门性视角来审视帝国主义的历史嬗变,重点考察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在不同时期形塑的政治及其效应。

## 一、前帝国主义的空间政治

从历史上看,“帝国主义”概念不是一以贯之的,其发展过程经历了多重转变。要正确理解帝国主义,就必须先论及“帝国”(empire)一词。英文“empire”的拉丁词源为“imperium”,“imperium”的词根为动词“imperare”(指挥、命令)<sup>[7](57)</sup>,所以“imperium”最初可直译为“军事指挥”(military command),早期关涉罗马将领们行使军事指挥权的领地<sup>[8](15)</sup>。因此在古代社会中,“帝国”往往意指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实力来控制 and 统治大片领土的国家政体,譬如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等。

帝国在古代社会拥有超强的统摄力,从一开始它就挟带了鲜明的空间性,最明显的表现是凸显在帝国所内含的领土面积上,“帝国意味着广阔的领土”<sup>[9](18)</sup>。汤姆·奈恩和保罗·詹姆斯将“帝国”定义为政体,即“将权力关系扩展到它们没有事先或被赋予法律主权的领土空间,并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的一个或多个领域中,他们在其中获得了一些为了提取或累积价值而对这些空间进行广泛霸权的措施”<sup>[10](xxiii)</sup>。人类历史上大凡能被称为“帝国”的政体,无不都拥有辽阔、绵延的领土空间。这里的“空间”是指地理维度上的空间。哈维谈道:“地理学史至少在部分上可以看成是地理学空间概念的历史,因为空间在地理学方法论中是一基本的组织概念”<sup>[11](232-233)</sup>。任何时候,地理空间都是现实中最常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空间,其不仅拥有明确的地理方位、地理体量及地理边界,还能够以其“可计算”与“可测度”等特性成为人们“可见”的实在,人的居住、劳作、生产、迁徙和交往,

都需要在特定地理空间中进行。杰弗里·马丁认为,“地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生活的空间”,通过地理空间,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人类居住以及人地关系的、更符合逻辑以及更有用的知识”<sup>[12](1-7)</sup>。早在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就用“imperium”一词来描述“权力的地理范围”(geographical extent of the authority)<sup>[13](13)</sup>。对于彼时的诸多帝国来说,没有什么比幅员辽阔的地理空间更能直接彰显自己的威权。在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爱德华·吉本开篇即指出,早期罗马帝国的伟大首先体现为领土面积的广袤,“为了更准确地说明罗马的伟大,也可以说,罗马帝国,从安东尼边墙和北部边界达西亚到阿特拉斯山北回归线的宽度便超过2 000英里,而从西海洋到幼发拉底河的长度则更是超过3 000英里;它位于温带中北纬24°至56°之间最美好的地区的面积估计也不少于160万平方英里,其中大部分都是肥沃的熟地”<sup>[14](26)</sup>。除此之外,考克斯、勒特韦克、克里斯坦森等学者还相继考证了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古埃及帝国等传统帝国所统辖的广阔领土,他们都认为广阔的领土空间是帝国身份的重要象征。

古代帝国对领土空间的热望,一直持续到现代的帝国主义。雷蒙·威廉斯指出,“帝国主义”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的语词<sup>[15](159)</sup>,该词最早用来指称拿破仑三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但突出体现在海外广泛开启殖民征服的大英帝国身上。需注意的是,尽管很多学者都承认“帝国”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sup>[16](6)</sup>,但现代帝国主义和古代帝国在领土空间的扩张上,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古代帝国的领土空间具有连续性和同一性,即所有领土都是接壤相邻的,不存在跨地域的空间管辖。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就提到,罗马帝国的征服都是从“所有邻接的城市开始”<sup>[17](6)</sup>。而现代帝国主义则多在遥远的海外进行领土扩张,其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并不存在空间上的地理对接,“通过合并由同一民族的成员居住的临近地区来扩大国家的企图,不是帝国主义”<sup>[18](2)</sup>。其次,古代帝国的领土扩张,其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封建专制时期的帝国荣耀和帝国统治者的威权，“一个伟大的帝国必然需要一个专制的权威来统治它”<sup>[9](18)</sup>，另一方面是为了威慑他国，避免自身受到侵犯。而现代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则是随资本主义诞生而生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实现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求的资本积累，保罗·斯威齐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积累过程中正在成熟的各种矛盾，为扩大的国家活动(state activity)，尤其是它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提供了新增的场地空间”<sup>[19](317)</sup>。其三，古代帝国注重与领土空间之间的统治型关系，而现代帝国主义除了维系这种统治关系，还透过“文化帝国主义”着力对其管辖的领土空间进行文化规训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正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分析的：“世界帝国君临于统治农业共同体的各国之上，但只要不与这种统治关系相抵触，它对内部的国家、部落的习惯并不关心。这与民族将成员同质化、帝国主义强制要求其他民族的同质性形成鲜明对比。”<sup>[20](32)</sup>

有鉴于此，我们得以看到古代帝国和现代帝国主义在空间话语上存在着明显的“内外”之别：古代帝国更重视空间的内部性整合，空间扩张基本都是由帝国内部空间延展开来，其经由战争而发动空间征服，意欲将原来分属帝国的外部空间融合到帝国之内，与帝国形成完整的空间统一体，由此塑形一种以帝国权威为内核的空间政治学。有学者提出，早期帝国是基于领土空间上存在地理接壤的“内陆帝国”(inland empire)<sup>[21](8)</sup>，而现代帝国主义在此基础上，纷纷进阶成为远航海外的“海外帝国”(overseas empire)，前者称之为“内帝国”(inner empire)，而后者“促进了海洋‘外帝国’的进一步扩张”<sup>[22]</sup>。古代帝国的“内向”，除了体现在领土空间的内部测绘上，还强烈地表征为帝国热衷于在其内部塑造诸多极具象征意蕴的空间显像，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即是帝国建筑。时至今日，以古罗马为代表的帝国建筑依然活跃在各类艺术问题的讨论中，其背后所映射的帝国风格也成为人们不可规避的话题。珀金斯认为，罗马建筑语汇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出现了以罗马特殊背景的、罗马特有的政治

和社会机构设施”，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罗马努姆广场”，它的四周环绕着罗马帝国最为神圣的建筑群：王宫(Regia)；维斯太小庙(Small Temple of Vesta)，庙里的圣火是城市生命精神的象征；卡斯托尔和波卢克斯庙；圣区之上的元老院会堂，这种空间上的形式排列，构成了罗马建筑的基本风格<sup>[23](8-9)</sup>。在类似于《建造帝国》(Engineering an Empire)之类的纪录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帝国内部的建筑空间在古代帝国的政治叙事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克里尚·库马尔认为，早期帝国在意的是其自身内部的“威权”(authority)，尤其是所谓的“皇家威权”(royal authority)，“在欧洲绝对主义的盛行时期，许多统治者都直接将其统治的领土称为帝国，帝国几乎成了至高权力的同义词”<sup>[24](9)</sup>。“内空间”的空间政治使得帝国统治者更加醉心于其内部统治，正如吉本强调的，古罗马帝王奥古斯一开始便满足于维持现有的统治，相比于征服更多的外部空间，他最关心的是其内部政权与领土的安全，因此他“放弃了野心勃勃征服全球的计划，并开始公共议会中实行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sup>[14](19)</sup>。显然，这与后来的现代帝国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 二、现代帝国主义的空间位移

古代传统帝国相继步入终结后，现代帝国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渐趋成型。陈其人将现代帝国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意味着“古代社会的罗马帝国主义、中世纪的日耳曼、蒙古帝国主义”与现代帝国主义之间既具有内在联系又存在着鲜明差异<sup>[25](3)</sup>，这一点得到了霍布森、霍布斯鲍姆、哈里·麦格道夫、大卫·哈维、阿提略·博龙等诸多学者的一致认同，列宁直接指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帝国主义”<sup>[26](80)</sup>。霍布斯鲍姆把1875年至1914年称为“帝国的年代”(age of empire)，其开启了以“殖民帝国”为首要症候的帝国主义时期<sup>[27](56-57)</sup>。

阿伦特倾向于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sup>[28](138)</sup>，与之不同的是，列宁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自诞生之初，并非就具备典型的帝国主义特性，只有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到较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这时资本主义才最终形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宁将“垄断”视为辨识帝国主义的关键症候，早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但这种自由竞争并没有开启真正的自由，而是逐渐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大财团打压小企业，使得资本和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中产生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这样的垄断性组织及机构<sup>[26](86)</sup>，帝国主义正是由此而登上历史舞台。列宁敏锐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使他既全面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本性，又清楚看到了帝国主义与一般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对于人们认识帝国主义的本真面目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帝国主义同样需要借助特殊的空间话语来施展其野心勃勃的规划。但和古代帝国主导的“内空间”不同，现代帝国主义已经无法满足于仅在本国内部进行资本的繁殖，远离其本土的海外空间才是他们聚敛财富的自由天地。由此，从古代帝国到现代帝国主义，其空间话语经历了一次从“内”向“外”的地理位移，背后映射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诉求。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由内向外，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其一是出于对“外空间”进行直接征服和掠夺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由哥伦布所领衔的远航勘探与地理发现，使得世界各地的空间实相开始逐一暴露在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他们惊觉地意识到，在遥远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存在着大量物产丰富、资源富足的“新大陆”，凭借军事力量上的巨大优势，他们可以对这些地方进行轻而易举地占领、殖民与统治。萨义德批评道：“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不属于你的、遥远的、被别人居住了和占有的土地的谋划、占领和控

制”<sup>[29](6)</sup>。显然，萨义德看到了现代帝国主义“由内向外”的空间位移：不再像古代帝国那样局限于周边相邻的领地，转而觊觎那些“遥远的”且不属于它们的空间领土。

其二是出于资本主义转移其内部矛盾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内，资本的流通、生产和拓值，无不需要打破既定的空间障碍(spatial barriers)，“资本主义生产在所有方面为消除空间障碍而做出的创新，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都是极具意义的”<sup>[30](232)</sup>。然而对于资本家们来说，国内空间存在着极大局限，根本无法涵容和消化资本发展的全部诉求，尤其是当资本主义衍化到一定阶段，它在国内所遭遇的空间障碍显得愈加突出：地理资源的刚性匮乏、市场供求的逐渐饱和、土地成本的日趋高昂、资本价值的生产过剩等等，无不宣示着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sup>[31](292)</sup>19世纪60年代前后，欧洲大陆和美国相继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内部，无论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生产扩大与资本增殖之间的矛盾，还是资本家与劳动阶层的阶级矛盾，都变得愈加突出。为此，他们迫切要将化解的途径从内向外转移，这种转移具有双重意蕴：资本家不仅们把内部危机和矛盾转移到“外空间”，而且还把资本积累和利益生产的重心转移到“外空间”。

“由内而外”的空间扩张，使得主张对“外空间”进行侵略征服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成了现代帝国主义的代名词。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部分论及了近世殖民学说，意欲借此来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交织的内外矛盾：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描述，其对资本的追求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与互利的基础之上，“那里的生产者，是以自己的劳动条件所有者的资格，依自己的劳动使自己致富，而非使资本家致

富”；但这种“母国资本主义”内部的美丽幻象在殖民地那里完全破灭了，资产阶级意识到，只有进行赤裸裸的征服、控制和剥削，才能满足其对资本积累的无尽渴望，因而他们不再掩饰，而是争相对殖民地的民众进行剥夺。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深恶痛绝地批判了帝国主义这种“内—外”截然不同的行径：“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sup>[32](690)]</sup>。无独有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分析近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时，也适时提到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内—外辩证法”，体现为“把它(自身)推出自身之外，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产过多的物质，或者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sup>[33](246)]</sup>。透过这种“内—外辩证法”，黑格尔从另一视角向我们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对外在的空间侵略，尤为关键的，它还包含了殖民征服后将内部矛盾向外部空间进行转移的深层诉求。

为了规避和弱化资本主义自身的内部矛盾，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迫不及待地对外殖民地进行瓜分，最直接地表现为领土空间面积的迅速扩容。据著名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考证，仅1871年到1900年间，英国海外殖民地便增加了450万平方英里，法国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增加了100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增加了90万平方英里<sup>[34](237)]</sup>。霍布斯鲍姆甚至指出，“帝国主义”一词，正是在对海外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sup>[27](60)]</sup>。这足以见出海外空间的殖民之于帝国主义的重要性。除了欧洲和美洲的部分领土外，世界各地基本上都已被现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帝国也由此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内—宗主国”和“外—殖民地”的基本格局。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通过现代帝国主义的极端形式，经由“从内向外”的空间位移，成功地让自己从内部弥漫的重重危机中抽离出来。

### 三、新帝国主义的空间整合

然而，帝国主义对“外空间”的依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外空间”对于帝国主义的臣服也不是一以贯之的。从空间的物理距离上来讲，“外空间”毕竟远离了作为“内空间”的宗主国，“离帝国的中心太远，帝国的中央影响力递减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sup>[35](1)]</sup>。随着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施加的剥削、压榨和统治的日益加剧，帝国主义贪婪的本相逐渐浮出水面，各殖民地开始陆续兴起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对抗帝国的非殖民化运动(Decolonization Movement)和反殖民运动(Anti-colonial Movement)。现代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境下日渐式微，对“外空间”直接进行扩张和地理征服的年代慢慢远去。1947年的印度独立作为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事件，正式宣告了以“日不落帝国”为代表的现代帝国主义在海外殖民地统治的帷幕落下，一如沃尔夫冈·蒙森所感叹的：“帝国时代已经终结，而且被埋葬了。”<sup>[36](113)]</sup>

当然，绝不能就此便冒失地以为，帝国主义真的迎来了如蒙森所说的“终结”。确切地讲，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退出，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消逝；帝国主义结束“外空间”的殖民扩张，也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灭亡。雷蒙·威廉斯曾经辨析了帝国主义的两种体现形式：其一是指某种“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的政治体系，基于这个立场，殖民地获得独立和自治权后，同时也就告示了“帝国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imperialism)；其二是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帝国主义，它包含着对“外空间”的投资和对市场及原料来源的掌控，从这个意义上，“殖民地的政治变革完全不影响对这种延续不断的经济体系所下的定义，即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sup>[15](159)]</sup>。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威廉斯看到了帝国主义背后所糅合的经济维度，这与列宁和希法亭的判断大体相似。希法亭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垄断”从根本上体现为金融资本的垄断，而“金融资本的政策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张，以

及对新的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不断的追逐”<sup>[37](337)</sup>，殖民主义是其最为直接但却并非唯一的实现方式。列宁也对此予以了认可，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sup>[26](121)</sup>。

换言之，殖民地是因帝国主义而出现的附属产物，但帝国主义绝不是只因殖民地而存在的事物。同样的道理，帝国主义结束对外空间的领土吞并不等于帝国主义放弃了对外空间的地缘依赖。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它就不可能摆脱依附于外部空间的宿命，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对空间加以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sup>[38](133)</sup>。事实上，对于诸多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以旧式殖民主义来管辖“外空间”的做法，本身就附带了不少问题，比如跨地统治的不确定性、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以及无处不在的文化抵触等，随着时代的演进，这种殖民扩张的做法显然已难以为继。更为关键的是，现代帝国主义“由内向外”的空间位移，为“外空间”和“内空间”之间制造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之间的对峙日渐突出，这不仅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对内空间规训，而且更不利于资本主义在外空间的进一步渗透。为此，它必须改变策略，借此来消解外部空间的反噬与包围，同时弥补因现代帝国主义的退场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正是在这种情境下登场的。需要强调的是，新帝国主义的“新”，更多地体现为手段、方式和策略之新，而非帝国主义的基底之新：“所谓的‘新帝国主义’与旧式帝国主义的手段和表现形式不同，其目的和本质却高度一致：二者都是强国为弱国，所谓‘有序的世界’为‘失序的世界’，即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为被其支配的国家制定和输出‘秩序’和制度。”<sup>[39]</sup>换言之，新帝国主义依然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显性形态，对弱国的剥削、压制和搜刮依然是其最终目的所在，只不过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比过往更为隐蔽、更具伪装性因而也更难被辨识的方式。从空间话语的角度看，旧式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无疑是直接的、荒蛮的和赤裸裸的，对于“外空间”进行简单粗暴的领土侵占便是其最佳

佐证；而新帝国主义则摒弃了这种过时的空间话语，转而建构一种新型的空间话语，这不仅能够维系资本主义在其他空间中的巨大利益，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趋缓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他空间中留存的负面形象。新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主要显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空间的简单掠夺过渡到空间的资本输出。新帝国主义无法再像旧帝国主义那样，经由战争侵略实现对于外空间的掠夺，但是他们可以将那些外在于帝国本部的空间，作为资本输出地和市场拓展地。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sup>[40](121)</sup>任何时候，资本的流通、周转和循环，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空间才能得以完成，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消化臻于饱和，就必定要寻求其它空间来促进过度积累资本的输出。这种情势下，资本主义不仅要开辟更大的市场空间，还要为其内部危机找到一个趋缓的转移地。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后半叶以来，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以“援助”之名，增加其在经济落后区域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投资，而受援国必须接受和满足它们提出的苛刻条件，从而为变相实现资本输出扫清空间壁垒。除此之外，它们还通过跨国公司、跨国企业、跨国银行、跨国工厂等形式，在外空间进行一系列的资本操作，剩余资本也由此在全球完成了极速的空间扩散。

其二，从空间的地理侵占过渡到空间的景观生产。哈维指出：“资本致力于塑造地理景观(geographical landscape)，借以促进其自身的再生产和衍化。”<sup>[41](146)</sup>当空间的地理侵占随着殖民帝国的消逝而退场，资本主义开始比以往更加注重空间的景观生产，在诸多发展中国家，随处都能看到大量由新帝国主义所生产的空间景观——修筑的公路铁路、扩容的商业中心、建造的工厂车间等，它们纷纷拔地而起，成为资本主义获取资本利润的重要场所。尤其关键的是，由于“商品”本身亦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视觉符号，其需要在空间中被制造、流通和买卖，因此新帝国主义还通过“商品”这种独特的空间景观，经由“商品拜物教”的内在句法，努力实现对全球各个地方

的新型征服。居伊·德波曾强调，“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在那些“很少工业化的地区”（第三世界及落后国家），商品的统治“业已为少数明星产品的到场，为工业化更加先进地区所强加的帝国主义的统治所证实”<sup>[42](15)</sup>。

当然，鉴于“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sup>[26](97)</sup>，在新时期，帝国主义无论是空间的资本输出，还是空间的景观生产，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形成经济垄断。在之后的年代里，帝国主义还会通过侵入众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和刻意打压众多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式，继续掌控全球霸权，进而制造动荡与失衡的世界格局。

#### 四、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批判

千禧年后，人类正式步入 21 世纪，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全球化促生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一方面，人类生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加速”革命，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人类还迎来了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时代——“历经三千年专业分工的爆炸性增长之后，由于人类肢体的技术性延伸而导致日益加剧的专业化和异化，这个世界因为戏剧性的逆变而收缩变小了，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sup>[43](5)</sup>。为此，人类的空间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更新，鲍曼提及的可测量的“客观性”<sup>[44](21)</sup>，不再是人们关注空间的唯一属性，虚拟空间、信息空间、货币空间、赛博空间、数字空间等新兴的空间类型，开始充斥着人类的生活。在这种情境下，“空间”的外在边界日渐模糊，绝对性让渡于相对性，一元性让渡于多元化，帝国主义的空间话语也由此而变得更加难以辨识。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一书，被视为是 21 世纪以来“帝国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术著作。在该书的开篇，作

者便向读者强调，当殖民帝国主义被舍弃，人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上不可抗拒且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恰如其分地利用了这次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的底下，资本主义“摆脱了政治理论强加于其身上的限制与扭曲”，一种名为“帝国”的新的主权形式应势而生<sup>[45](xi)</sup>。和现代帝国主义退出殖民统治的初期阶段相比，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上诸多国家已完全走出了反殖民运动的政治网格，“过往独立的国家与民族正被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及规则之网串联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sup>[46](1)</sup>，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为此，资本主义国家非但不能重返旧式帝国主义的殖民式侵略，也不能简单凭借帝国主义的传统伎俩来实现对他国的轻松压制，过往那种“内外分明”“由内向外”的空间叙事很难再用来解读全球化语境下的帝国主义动向。正如全球化不再凸显空间的绝对边界，哈特和奈格里所强调的“帝国”也不再倾心于空间的内外之别。“正式地去殖民化和战后移民及定居，已经使一个实体化的边缘进入了帝国中心”<sup>[47](160)</sup>，帝国建构了内外并行、内外互渗的空间话语：一方面它们继续借助跨国公司、跨国金融等来完成其资本利润的空间重组，并通过在部分地方的发动战争和在特定区域施行制裁来维系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它们也开始有选择性地接纳其他空间的逆向回溯，比如批准他国百姓的移民、允可他国产品的进入等，从而在文化印象上制造某种极具迷惑性的风格做派。除此之外，网络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身，更是形象地宣告了帝国主义作风已然延续到了虚拟空间和文化空间，进一步渗透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奈格里在某次演讲中提到了这种空间话语的转变：“任何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积累过程中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观点，都可能无法认清这个过程的动态性实质。从形成市场和帝国的过程来看，中央与边缘实际上越发相互交织、难解难分。”<sup>[3](5)</sup>

但这种“内外互渗”的空间话语，更多指向了形式而非目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采用这种



空间话语,只是为适应全球化而改变的某种策略与手段,其目的不是为了在全球推广内外无别的空间共同体,更不是霍布森所说的“民族性的自然外溢”,而是设法延续其内部惯有的空间霸权,强势主导其他“外空间”的命脉。尽管和过往的帝国主义相比,如今“帝国不再建立权力的中心,也不倚靠固定的疆界与界限,它是一架无中心和无疆界的统治机器”<sup>[45](xii)</sup>,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混淆了内外空间的差异。无论帝国主义如何演变,其空间话语如何转换,本质上,“资本主义离开了利益就不能生存”<sup>[48](49)</sup>,它永远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一面贪得无厌地剥削外部空间,一面厚颜无耻地压制外部空间。为此,我们必须警醒地认识到,任何时候,帝国主义空间话语都必然内含以下三种趋向:

第一,凸显空间的等级性。由帝国主义主导的空间话语素来便具有强烈的内外二元性,从殖民帝国主义时期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到新帝国主义时期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再到如今依然盛行的“霸权主义”(Hegemonism),帝国主义一直在变本加厉地推行内外对立的空间政治——帝国之内永远优越于帝国之外,帝国之内永远文明于帝国之外。詹姆斯·布劳特反讽地将之形容为“空间精英主义”(Spatial Elitism),因为它主张将世界区分为“一个永久的中心(center)”和“一个永久的外围(periphery)”<sup>[49](12)</sup>,人类生活的地表空间在意识形态上被粗暴地划割为极不公正的等级性区块。可以看到,在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基于地域空间而形塑的种族歧视、种族排斥和种族仇恨等问题,直到现在依然随处可见,其背后无不反映了空间的根深蒂固的等级差异性。借助于这种空间等级上的优越感,帝国主义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愚昧荒蛮”的地区进行殖民侵略,还能“光明正大”地对“落后守旧”的地方进行干涉制裁,赤裸裸地展现其盛气凌人的空间霸权。哈维直接批评道:“许多被当成帝国主义的东西都立足于一种现实,即一个区域的民族在某个有优势的、统治性的、压迫性的权力的庇护下剥削另一个区域的民族。”<sup>[50](673)</sup>

第二,追求空间的非均衡性。这里的非均衡性并不等同于差异性,因为差异性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非均衡性则是一种人为刻意制造的失衡和不对等。人类自诞生以来便共同生存于地表空间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相应的地理差异和文化差异,人们理应认同这种差异。然而帝国主义引领的空间话语,则将这种“差异性”异化为“非均衡性”,即在空间关系上亲近与己有利的伙伴而打压与己无利的国家,在空间认知上推崇资本属性强的空间而漠视资本属性弱的空间,在空间政治上倡导空间的恶性竞争而忽略空间的差异认同。由于“资本家们总是会蜂拥到那些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sup>[51](162)</sup>,他们必然要时刻以“利润”来作为衡量一切空间价值的尺度,“非均衡地理学”(uneven geography)因而成为了帝国主义空间话语中如影随形的逻辑句法,全球空间被他们化作一个“松散拼接体”(loosely connected mosaic)而非“命运共同体”,导致“有些地方越来越富有,有些地方越来越贫穷”<sup>[41](150)</sup>。

第三,制造空间的破坏性。由于帝国主义总是意图掠夺抢占其他空间的利益,因此其必然会伴随着各种暴力手段,如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sup>[26](89)</sup>。暴力手段必将导致空间被破坏,无论是战争侵略对领土空间的实际性破坏,还是资本渗透对地方空间的潜在威胁;无论是殖民剥削对空间正义的极致破坏,还是寡头政治对空间秩序的持续压榨,都逐一向世人展现着帝国主义空间话语所内构的“破坏性”。如果说熊彼特可以温和地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概括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sup>[48](83)</sup>,那么作为资本主义本相的极端形态,帝国主义为世界所带来的则完全是一种“根本性破坏”(radical destruction),其目的是要破坏世界空间应有的有序与和谐,在颠倒是非的空间话语中悄然实现自我危机的空间修复。

当然,尽管列宁、熊彼特等学者一致认为帝国主义终将随资本主义一起被历史所淘汰,但在时代漩涡中,帝国主义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以实现暂时的残存。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



主义政体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不断展现出的傲慢、蛮横与打压，更是形象地暗示了它们努力为帝国主义招魂的恶劣企图。更应引起注意的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兴起的“逆全球化”风潮，破坏人类在全球空间本应持有的共通与共存，将空间的“内外”之分演绎得更加微妙与复杂。在这种情境下，对嬗变的帝国主义及其空间话语进行批判性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辨识帝国主义的动向和透视帝国主义的本质。

### 参考文献：

- [1] DAVID M. Understanding imperialism: Old and new dominion[EB/OL]. (2005-11-7) [2020-11-23]. <https://againstthecurrent.org/atc117/p255/>.
- [2]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 沈晓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M]. Trans. CHU Lizhong, SHEN Xiaole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2009.
- [3] 安东尼奥·内格里. 超越帝国[M]. 李琨, 陆汉臻,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ANTONIO N. Reflections on empire[M]. Trans. LI Kun, LU Hanzh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4] JANE M J.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5] MICHEL F.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6] 吴红涛. 后现代主义话语的空间表征[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25(3): 19-25.  
WU Hongtao.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postmodernist discourse[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 25(3): 19-25.
- [7] JOHN R. The language of empire: rome and the idea of empire from the thirdcentury bc to the second century A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8] TOM S. Julius caes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9] DOMINIC L.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TOM N. PAUL J. Globalization and violence, Vol. 1: Globalizing empires, old and new[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 [11] 大卫·哈维. 地理学中的解释[M]. 高泳源, 刘立华, 蔡运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DAVID H.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M]. Trans. GAO Yongyuan, LIU Lihua, CAI Yunl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 [12] 杰弗里·马丁. 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学思想史[M]. 成一农, 王雪梅,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GEOFFREY J M.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M]. Trans. CHENG Yinong, WANG Xueme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8.
- [13] ANTHONY P. Lords of all the world[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4]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M]. 黄宜思, 黄雨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EDWARD G.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M]. Trans. HUANG Yisi, HUANG Yush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15] RAYMOND W.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6] ATILIO A. B. Empire and imperialism[M]. Trans. Jessiea Casiro. London: Zed Books, 2005.
- [17] 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原因论[M]. 婉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MONTESQUIEU. On the cause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rome[M]. Trans. WAN L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 [18] 卡尔·考茨基. 帝国主义[M]. 史集,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4.  
KARL K. Imperialism[M]. Trans. SHI J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 [19] PAUL M.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M]. London: Dennis Dobson Limited, 1962.
- [20] 柄谷行人. 民族与美学[M]. 薛羽,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6.  
KARATANI K. Nation and aesthetics[M]. Trans. XUE Yu.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1] JOHN H. Weeks. Inland empire[M]. Chicago: Arcadia Publishing, 2008.
- [22] 张杨. 永不消逝的帝国/民族二重奏[J]. 读书. 2020(2): 124-134.  
ZHANG Yang. An empire/nation duo that never fades[J]. Du Shu. 2020(2): 124-134.
- [23] 约翰·B.沃德-珀金斯. 罗马建筑[M]. 吴葱, 张威, 庄岳,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JOHN B. Ward-Perkins. Roman architecture[M]. Trans.

- WU Cong, ZHANG Wei, ZHUANG Yue.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1999.
- [24] KRISHAN K. 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5] 陈其人. 帝国主义理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CHEN Qiren. Theoretical studies of imperialism[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84.
- [26]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LENIN. Imperialism is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 [27] ERIC H.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 [28] HANNAH A.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M]. New York: A Harvest Book, 1994.
- [29] 爱德华·W.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Trans. LI K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 [30] DAVID H.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1] Anthology of Marx and Engels: Vol. 9[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Anthology of Marx and Engels: Vol. 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33]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M]. Trans. FAN Yang, ZHANG Qit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 [34] CARLTON J. H. H.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1871—1900[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1.
- [35] 马娅·亚桑诺夫. 帝国边缘[M]. 朱邦芊,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MAYA J. Edge of Empire[M]. Trans. ZHU Bangqia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2009.
- [36] WOLFGANG J.M. Theories of Imperialism[M]. Trans. P. S. Fall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37] 鲁道夫·希法亭. 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M]. 福民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RUDOLF H.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in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M]. Trans. FU Min,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38] 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HENRI L. Space and politics[M]. Trans. LI Chu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8.
- [39] 周穗明. “新帝国主义论”及其批判述评[J]. 国外社会科学, 2004(3): 32—37.
- ZHOU Suiming. "New Imperialism" and its Criticism[J]. Social Science Abroad, 2004(3): 32—37.
-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Anthology of Marx and Engels: Vol.6[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41] DAVID H.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2]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GUY Debor.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M]. Trans. WANG Zhaofe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3] MARSHALL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 [44] ZYGMUNT B.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 [45] MICHAEL H, ANTONIO N. Empi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6] ANTHONY 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 [47] JANE M. J.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48]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49] J. M. B.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 [50]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M]. 张寅,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DAVID H. The limits to capital[M]. Trans. ZHANG Yin.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7.
- [51] DAVID H.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Transmuted imperialism and its critique of spatial discourse

WU Hong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334001, China)

**Abstract:** Space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imperialism.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mperialism has shaped a highly recognizable spatial discourse. Whether it is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geographical colonization of the old imperialist period, or the capital export and market monopoly of the new imperialist period, imperialism contains a distinct spatial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imperialism, out of the need to transfer internal space contradictions and to resolve its internal space crisis, its spatial discourse has undergone a geographical displacement from inside to outside, and the occupation of "the outer space", deprivation and suppression has become the main spatial strategies of imperialism. With the end of colonial rule, imperialism has turned to adopting more disguised and deceptive spatial discourse, and continued to maintain its spatial hegemony outside the empire. The spatial discourse of imperialism will inevitably highlight the hierarchical nature of space, the pursuit of spatial imbalance, and the destructiveness of creating space.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evolving imperialism and its spatial discourse will help us identify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imperialism and the essence of imperialism.

**Key Words:** imperialism; space; empire; colonial; hegemony

[编辑：游玉佩]